

知义不知害：儿童网络语言使用中的 认知发展不同步

——基于医务社会工作实习的探索性研究

冯慧雯, 李琳蕾

北京建筑大学社会工作系,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3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2日

摘 要

既有研究多以“语义空心”解释儿童网络语言使用, 认为幼儿因不理解词义而盲目跟风, 但难以解释部分儿童通晓语义却漠视语言伤害的现象。本研究依托北京某三甲医院“微笑空间”游戏治疗场域,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对3名住院患儿(4~7岁)开展参与式田野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 并对3名教育与社会工作从业者进行访谈, 运用Braun & Clarke六步主题分析法整理资料。研究发现, 在就医患儿这一特殊群体中, 部分儿童呈现出“知义不知害”的认知特征, 体现在能够解释网络语言的语义内涵, 但对语言可能造成的伤害缺乏共情反应的方面。儿童通过“开玩笑”的话语重构、沉默回避、网络知识区隔、责任外部化等策略维持这一认知状态。研究认为, 这一现象需置于4~7岁儿童正常道德发展阶段, 即皮亚杰前运算阶段及科尔伯格前习俗水平中理解, 数字媒介环境可能放大了语义认知与伦理认知之间的发展不同步, 而非造成病理性的认知缺陷。本研究定位为探索性案例研究, 旨在补充“语义空心”理论的解释边界, 为医务社会工作在医疗情境中的干预实践提供参考, 并指出未来需在普通儿童群体中验证这些发现的适用性。

关键词

儿童网络语言, 语义 - 伦理认知发展不同步, 语义空心, 医务社会工作, 质性研究

“Knowing the Meaning but Not the Harm”: Developmental Asynchrony in Children’s Use of Internet Language

—An Exploratory Study Based on Medical Social Work Practicum

Huiwen Feng, Linlei Li

文章引用: 冯慧雯, 李琳蕾(2026). 知义不知害: 儿童网络语言使用中的认知发展不同步. *心理学进展*, 16(8), 109-120.
DOI: 10.12677/ap.2026.168380

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often explains children's use of internet language through the lens of "semantic hollowness," positing that young children blindly follow trends due to their inability to comprehend word meanings. Yet this framework fails to account for the paradoxical phenomenon wherein some children fully understand semantic content yet remain indifferent to the harm caused by language. Drawing upon the "Smile Space" play therapy setting at a tertiary hospital in Beijing, this study employ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conducting participatory field observation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three children in medical settings aged 4~7, alongside interviews with three education and social work practitioners.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Braun & Clarke's six-phase thematic analysis. Findings revealed that within this special population of children in medical settings, some exhibited a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 of "knowing the meaning but not the harm": they were capable of explaining the semantic connotations of internet language but lacked empathic responses to the potential harm inflicted upon others. Furthermore, they actively maintained this cognitive state through strategies including reframing through the "just joking" framework, silent avoidance, internet knowledge compartment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is phenomenon should be understood within the normal moral development stages of 4~7-year-old children (Piaget's preoperational stage, Kohlberg's preconventional level), and that the digital media environment may have amplified the developmental asynchrony between semantic and ethical cognition rather than causing pathological cognitive deficits. Positioned as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aims to supplement the explanatory boundaries of the "semantic hollowness" framework, provide reference for medic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practice in healthcare settings, and indicate that futu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validate these findings among general child populations.

Keywords

Children's Internet Language, Semantic-Ethical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Asynchrony, Semantic Hollowness, Medical Social Work, Qualitative Researc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与短视频平台的深度普及,网络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低龄群体渗透。“奥利给”“芭比Q”“绝绝子”等话语不仅进入儿童的日常表达系统,更衍生出大量带有攻击性、性别贬抑或身体羞辱色彩的俚语(牛煜辉, 2025)。对于 4~7 岁这一正处于语言爆发期与道德发展初期的儿童群体而言,网络语言的伦理维度尤为敏感,他们既在主动吸纳数字媒介的话语资源,又尚未形成稳定的共情能力与道德判断机制(陈会昌, 2004)。儿童网络语言使用由此成为一个兼具语言学、发展心理学与社会工作关怀的跨学科议题。

既有研究多从“语义空心”(semantic hollowness)视角解释低龄儿童的网络语言使用,认为幼儿因认知尚未成熟,仅将网络语言视为趣味符号进行盲目模仿,不理解其背后的侮辱性与攻击性内涵。这一解

释框架揭示了部分儿童的语言认知特征, 却也存在显著的边界局限: 它将儿童预设为网络话语的被动接收客体, 过度强调其幼稚化与无知化, 却忽略了部分儿童实际上具备完整的语义解码能力。当儿童能够清晰复述一句网络脏话的攻击逻辑, 明确知晓其羞辱指向, 却仍对语言可能造成的伤害漠然视之时, “语义空心”便失去了解释力。这一“知义不知害”的悖论现象, 提示儿童网络语言使用的认知机制或许并非单一的“不懂”, 而是“知”“义”“害”之间的复杂错位。

更为关键的是, 现有实证研究多取样于中小学课堂或家庭场景(陈向明, 2000), 缺乏医疗情境中就医患群体的质性数据。就医患儿面临疾病压力、诊疗程序带来的焦虑及医疗环境的陌生感, 其情绪状态与社会交往模式可能与普通儿童存在系统性差异; 同时, 医疗情境中的权力依赖关系也可能影响儿童的语言使用策略与成人的干预方式。对于在“微笑空间”等疗愈场域开展服务的医务社会工作者而言, 面对儿童攻击性网络语言时, 单纯的行为制止往往难以奏效, 而专业干预工具的缺失又使社工陷入“知其有害却不知如何回应”的实务困境。因此, 在医务社会工作场域中探索儿童网络语言使用的认知特征, 不仅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理论价值, 更直接回应了临床干预的现实需求(顾东辉, 2019)。

基于上述背景, 本研究依托北京某三甲医院“微笑空间”游戏治疗场域,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对3名4~7岁住院患儿开展参与式田野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 并对3名教育与社会工作从业者进行深度访谈。研究运用 Braun & Clarke (2006) 六步主题分析法, 尝试提出“语义-伦理认知发展不同步”(developmental asynchrony)的分析概念, 将“知义不知害”现象置于皮亚杰前运算阶段及科尔伯格前习俗水平的正常道德发展框架中加以理解, 以期补充“语义空心”理论的解释盲区, 搭建“知-义-害”认知类型框架, 并为医务社会工作在医疗情境中的伦理对话干预提供实践参考。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为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第二部分回顾“语义空心”研究脉络并搭建理论框架; 第三部分介绍研究方法与伦理考量; 第四部分呈现核心研究发现; 第五部分展开理论讨论; 第六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分层实务建议。

2. 问题提出: 一个“知道却不在乎”的困惑

2.1. 研究背景

随着移动互联网与短视频媒介的普及, 网络语言的使用者年龄阶段呈现下移趋势, 网络语言的攻击性特征也有所增强, 而4~7岁儿童作为网络内容的早期接触群体, 其语言使用受到家庭、同伴及数字媒介的多重影响(牛煜辉, 2025)。儿童网络语言使用本身是一个中性的社会语言现象, 既有娱乐化、社交性的功能, 也可能包含攻击性、贬损性的表达。现有研究对这一群体的关注相对有限, 尤其缺乏医疗情境中就医患儿童网络语言使用的质性数据。

本研究田野场域为北京某三甲医院“微笑空间”, 专为就医患儿提供游戏、绘画等疗愈服务。选择这一场域的原因在于就医患儿面临疾病压力、医疗环境适应及诊疗程序带来的焦虑等特殊状况, 其情绪状态与社会交往模式可能与普通儿童存在差异; 同时, 医疗情境中的权力关系, 如患儿对医护人员、家长的依赖等, 也可能影响其语言使用策略。因此, 本研究发现不宜直接推广至普通儿童群体, 而应视为对特殊情境下儿童网络语言使用的探索性观察, 为理解儿童网络语言使用的内部异质性提供参考。

2.2. 核心困惑

在2026年6月10日的绘画活动观察(F-005)中, 男孩C-G多次对同伴说出“割掉他的鸡鸡, 让他变成小女孩”, 笔者上前制止并追问其行为动机, 儿童全程沉默回避, 仅主动补充一句: “这是在开玩笑。”在后续访谈C-001时, 笔者进一步求证, 该儿童清晰知晓这句话的攻击逻辑, 能够复述反击话术, 同时坦言使用时内心的情绪是“开心的”, 并且表达出在网络上使用该类语言频率更高, 但在学校时会刻意收敛。

这一案例引发了研究者的关注, 现有“语义空心”解释认为儿童因不理解词义而跟风模仿, 但 C-G 的表现显示, 部分儿童可能具备语义理解能力, 却仍使用伤害性语言。值得思考的是, 这一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是 4~7 岁儿童正常道德发展阶段的特征, 如自我中心主义、换位思考能力有限等, 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数字媒介环境的影响?

从发展心理学视角看(安·玛丽·哈尔佩妮, 简·皮特森, 2020), 这一案例具有三重特征, 其一是持续性, 当 C-G 在被制止后仍不停息, 继续说出攻击语言; 其二是场域区分意识, C-G 主动补充“在学校里会较少使用, 在网络上会使用较多”, 显示其对不同空间规则有清晰认知; 其三是框架重构, C-G 将攻击性行为定义为“这是在开玩笑”。而在后续访谈中, C-G 能够复述该话语的攻击逻辑, “把你的鸡鸡割掉, 这样你就变成女生生了”, 并将使用动机描述为“开心的”。在与学校社工 T3 的访谈中也提供了跨场域的类似观察: “很多很多学生他其实是知道这个含义的,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危害”。这些资料共同提示, 在就医患儿及学校儿童中, 均存在部分儿童“知语义但不懂伤害”的现象, 值得进一步探索。

2.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2.3.1. 研究目的

首先, 在理论层面描述就医患儿群体中“知义不知害”的认知特征, 补充“语义空心”理论的解释边界, 搭建“知-义-害”认知类型框架; 其次, 在实证层面依托田野观察与访谈资料, 梳理就医患儿维持语义-伦理认知发展不同步的话语策略, 探讨这一现象与正常道德发展阶段的关系; 最后, 在实务层面回应医务社工面对就医患儿网络语言使用的干预困境, 探索适配医疗情境的干预思路。

2.3.2. 研究意义

本研究理论意义在于, 在尊重 4~7 岁儿童正常道德发展规律的前提下, 探讨数字媒介环境对语义认知与伦理认知发展节奏的影响, 为儿童网络语言研究提供补充性视角, 实务意义在于为医务社会工作在医疗情境中的干预实践提供参考, 并指出未来需在普通儿童群体中验证这些发现的适用性。

3.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3.1. “语义空心”: 现有研究的主流解释及其边界

国内儿童网络语言相关研究多以“语义空心”作为核心分析视角, 认为低龄儿童接触网络语言仅追求趣味性, 不理解词汇背后侮辱、攻击性内涵, 纯粹跟风模仿, 网络语言仅作为同伴群体身份标识, 儿童只是被动接收话语的客体(赵雪凝, 2023)。大量学前、小学阶段实证研究指出, 幼儿媒介接触时间早、认知尚未成熟, 难以辨别网络话语的褒贬属性, 出现不分场合随意使用网络俚语的现象。

但该理论存在显著边界局限, 其一在于将儿童过度幼稚化, 预设儿童不具备完整语义理解能力, 忽略部分儿童能够清晰拆解语言逻辑的现实; 其二在于仅能解释完全不懂词义、鹦鹉学舌的幼儿, 无法覆盖“通晓语义、仍使用伤害性话语”的群体; 其三在于现有实证样本多取自中小学课堂, 缺少医院疗愈场域、就医患儿群体的质性数据支撑, 难以回应医务社工在特殊情境中的实务困境。本研究田野资料中 C-G、T3 的访谈内容, 提示“语义空心”理论存在解释盲区, 需要补充性研究予以细化。

3.2. 理论缺口: 当“知道”不等于“在乎”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 4~7 岁儿童“知语义但不懂伤害”的现象, 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经典发展心理学理论的解释。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 2~7 岁儿童处于前运算阶段, 思维具有自我中心特征, 难以从他人视角理解问题(安·玛丽·哈尔佩妮, 简·皮特森, 2020); 同时,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将 4~10 岁界定为前习俗水平, 道德判断主要依据行为后果和外部奖惩, 而非内在动机和共情能力。此外, 心智

理论(Theory of Mind)研究表明(刘金花, 2013), 4~5 岁儿童才开始发展换位思考能力, 7 岁左右才逐步成熟。因此, “不懂伤害”在相当程度上是该年龄段儿童的正常发展特征, 而非病理性的认知缺陷, 国内学者同样发现, 道德脱离水平与儿童的攻击行为、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关联(范翠英等, 2012)。

然而, 本研究关注的是在数字媒介环境下, 这一正常的发展特征是否被异常放大? 在传统面对面互动中, 儿童通过观察对方的表情、语气、肢体反应, 逐步习得“话会伤人”的伦理知识, 但在短视频环境中, 语言被剥离了完整的伤害情境, 仅保留情绪刺激片段, 儿童可能在没有对应伦理体验的情况下, 过早、过多地习得了攻击性语言的语义。本研究将这一现象描述为语义-伦理认知的发展不同步(developmental asynchrony)——语义认知通过反复媒介接触获得超前发展, 而伦理认知的正常发展路径即通过完整社交情境逐步习得的, 被部分阻断, 二者之间的落差在媒介环境中被扩大。

需要区分的是, 学界“道德脱离”理论(moral disengagement)多用于解释青少年网络欺凌, 指个体主动运用认知策略剥离道德责任(Bandura, 2016)。Bandura 等(1996)最早系统提出道德脱离的八种认知机制, 用以解释个体如何在伤害行为中维持道德自我认同。该机制作为解释攻击行为的重要认知机制, 已得到国内外广泛实证支持(杨继平, 王兴超, 高玲, 2010), 并被进一步拓展至网络偏差行为领域(杨继平, 王兴超, 高玲, 2015)。近期元分析研究亦证实, 道德推脱与儿童青少年的欺凌行为之间存在稳定正相关(李欣等, 2023)。然而, 4~7 岁儿童尚未形成稳定的道德自我调节能力, 其“不知伤害”更可能是发展性局限而非主动性策略。研究表明, 道德推脱机制在个体面对攻击情境时会被选择性激活(Thornberg et al., 2020), 儿童期道德推脱同样与攻击行为密切相关, 但其发展特点与青少年阶段存在差异(杨继平, 王兴超, 2012; 王兴超, 杨继平, 杨力, 2014)。本研究不主张将儿童的行为道德化或病理化, 而是将其置于正常发展框架中, 探讨媒介环境对这一发展过程的影响。校园欺凌研究进一步指出, 道德情绪与道德价值观在道德脱离与欺凌行为之间扮演重要调节角色(Thornberg et al., 2015), 这为理解儿童网络语言中的伦理认知滞后提供了跨情境参照。

3.3. 分析框架：“知-义-害”认知类型框架

本研究以语义理解、伦理认知两个维度划分四类儿童网络语言认知形态, 构建“知-义-害”认知类型框架(见表 1)。需要强调的是, 这一框架旨在描述儿童网络语言使用的内部异质性, 而非对儿童进行价值判断或病理分类。

Table 1. Children's online language cognition type framework
表 1. 儿童网络语言认知类型框架

类型一：语义-伦理均有限	语义理解低, 伦理认知低	典型表现为完全不懂词义, 单纯模仿	这一类型符合现有“语义空心”解释
类型二：语义超前、伦理滞后	语义理解高, 伦理认知低	典型表现为懂语义, 但对伤害不敏感	这是本研究在就医患儿样本中观察到的现象
类型三：语义有限、伦理敏感	语义理解低, 伦理认知高	典型表现为不懂词义, 但直觉回避	这一类型在样本中较少见
类型四：语义-伦理协调发展	语义理解高, 伦理认知高	典型表现为理解语义与伤害, 主动约束	这是理想状态

本研究样本中的就医患儿主要呈现类型二特征, 即“知义不知害”。这一现象需置于 4~7 岁儿童正常道德发展框架中理解——该年龄段儿童本身处于共情能力和换位思考能力的发展初期, 数字媒介环境可能放大了语义认知与伦理认知之间的发展落差。

3.4. 辅助分析理论

本研究借鉴以下理论视角辅助分析, 但不主张将儿童行为过度理论化或政治化:

第一, 话语框架理论。借鉴戈夫曼(Goffman)的框架分析概念(Goffman, 1974), 儿童使用“开玩笑”等话语, 可能是在特定社交情境中习得的一种情境定义方式, 将冲突性互动重新定义为游戏性互动, 以降低社交紧张, 这一分析关注儿童如何在具体情境中理解和使用语言, 而非将其视为有意识的权力策略。

第二, 语言与社会边界。借鉴布迪厄(Bourdieu)关于语言作为社会区分工具的观点(Bourdieu, 1992)儿童使用“你回去多上网”等话语, 可能反映了其试图在代际之间划定知识边界, 但需注意, 这种“边界”更可能是儿童在媒介饱和环境中自然形成的社交习惯, 而非有意识的资本积累策略。

第三, 沟通回避策略。儿童面对成人追问时选择沉默, 可以理解为一种沟通中的回避模式, 其功能可能是避免不愉快的社交互动。当然, 从日常生活实践视角看, 儿童的沉默与回避亦可视为面对成人权力时的一种空间战术(吴飞, 2009), 但本研究认为, 对 4~7 岁儿童而言, 这更可能是发展中的沟通技能局限; 将儿童沉默解读为“战术”可能过度政治化了儿童的日常行为。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场域与研究时段

本研究田野场域为北京某三甲医院儿童病区“微笑空间”, 由基金会社会工作者运营, 面向 4~7 岁就医患儿提供绘画、折纸、游戏等免费疗愈活动, 活动全程无严格课堂纪律约束, 儿童真实互动行为可完整观察。研究时段为 2026 年 5 月 12 日至 6 月 24 日。

4.2. 数据来源与目的性抽样

采用质性研究三角互证法(陈向明, 2000), 三类数据相互交叉验证, 数据概况如下:

田野观察共开展 5 次, 采用目的性抽样, 选取出现网络语言的绘画、折纸活动进行完整记录, 旨在呈现认知发展不同步在场景中的运作逻辑。

儿童访谈共 3 人, 包括 C-001 (男, 主动攻击型)、C-002 (男, 娱乐使用型)、C-003 (女, 旁观跟随型), 采用目的性抽样, 旨在获取语义、伦理认知的一手表述。

教育工作者访谈共 3 人, 包括 T1 (前教师)、T2 (实习教师)、T3 (学校社工), 采用目的性抽样, 覆盖不同教育岗位, 实现跨场域外部验证。

4.3. 分析方法

所有田野笔记、访谈录音转录为纯文本资料, 采用 Braun & Clarke (2006) 六步主题分析法完成编码: 熟悉资料→生成初始编码→提炼核心主题→复核主题→定义主题内涵→撰写分析报告。使用手工编码表完成资料标记, 区分“语义解释、情感动机、框架转换、沟通回避”等核心编码。

4.4. 研究伦理、反身性与研究局限

4.4.1. 研究伦理

所有研究对象统一匿名编码, 儿童访谈取得患儿口头同意, 成人访谈提前告知录音用途, 征得受访者许可, 原始资料仅用于论文写作, 完成后统一封存。

4.4.2. 研究者反身性

笔者兼具社工实习生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 进入场域初期没有任何预设儿童使用攻击性网络语言的情

况, 从实践中发现儿童使用网络语言的“知义不知害”特征, 由此催生本研究核心问题。全程保持自我反思, 避免研究者偏见干扰资料解读。

4.4.3. 研究局限

本研究为探索性案例研究, 样本量偏小, 仅单一医院场域, 缺少家长访谈、音乐疗愈场景观察记录; 儿童仅划分 4~7 岁区间, 无精确年龄分层, 影响与皮亚杰、科尔伯格阶段理论的精确对照; 研究结论不具备大范围推广效力, 尤其不宜直接推广至普通儿童群体。

5. 研究发现

5.1. 语义层面的“知道”：儿童并非“语义空心”

现有研究普遍预设儿童无法理解网络语言内涵, 但本研究多方资料交叉证明, 多数儿童具备完整语义解读能力, “语义空心”无法覆盖样本特征。

首先, 田野观察与儿童访谈直接佐证儿童语义认知完整。在 F-005 中 C-G 说出“割掉他的鸡鸡, 让他变成小女孩”, 随后在访谈 C-001 时, 该儿童能够完整复述该话语的攻击逻辑, 且清晰知晓这句话指向身体、性别羞辱; C-002 明确表示自己“知道奥利给的含义”, 能够区分网络语言的使用场景; F-004 中 C-F 主动指认网络是语言来源, 具备清晰的来源认知。

其次, 学校社工 T3 提供跨场域佐证: “很多很多学生他其实是知道这个含义的,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危害”, 一线教育实务场景同样存在大量通晓词义的儿童, 证明儿童理解语义是普遍现象。

最后, 儿童具备清晰的场域区分能力。C-G 能够明确区分网络语言在不同场景的使用模式, 表达出“学校少用、网络多用”的态度, 也知晓家庭中母亲会制止他使用该类语言, 足以证明其并非懵懂跟风、完全不懂词义的“空心”状态。综上, 本研究样本核心矛盾不在于“不懂意思”, 而在于“懂意思却不在乎伤害”, 因此研究重心需转向伦理认知层面。

5.2. 伦理层面的“不知”：知其意, 不知其害

研究发现, 样本儿童普遍存在语义-伦理认知发展不同步, 即完整掌握语义, 但无法共情语言带给他人的心理伤害, 道德判断仅依托即时快感, 形成“语义超前、伦理滞后”状态。

第一, 情感替代伦理, 即时愉悦是使用核心动机。访谈 C-001 被问及说攻击性话语的感受时, 直接回答“开心的”; C-002 描述使用“奥利给”“给我擦皮鞋”时“比较开心的状态”。依据科尔伯格前习俗道德特征, 4~7 岁儿童仅以自身快乐与否判断行为价值, 完全忽略他人情绪, 伦理判断被个人快感完全替代。这一特征符合该年龄段儿童的正常道德发展水平。

第二, 伤害后果意识空白, 刻意回避换位思考。当笔者追问 C-G “为什么要说伤害同伴的话”, 儿童全程沉默不回应; 即便被问及同伴感受, 也仅描述“跟着一起笑, 但是有一些尴尬”, 无法共情尴尬背后的受伤情绪, 同时儿童主动转移责任: “不解释, 让他们自己去寻找这句话的含义”, 将理解、承受伤害的责任全部转移给对方, 自身剥离伦理责任。

第三, 不同性别样本验证伦理认知滞后的普遍性。女孩 C-003 虽未主动使用攻击性语言, 但旁观同学使用时仅“跟着一起笑”, 同样无法识别话语伤害, 男女儿童均存在共情缺失的情况。网络欺负研究指出, 旁观者的在场与反应会显著影响欺负行为的持续与扩散(黄勳喆等, 2019), C-003 的旁观发笑正体现了这一机制。

5.3. 正文发展不同步的维持：儿童运用四类策略

儿童并非被动陷入语义-伦理认知发展不同步, 而是通过特定话语策略维持这一状态。需要强调的

是, 这些策略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是发展中的社交习惯, 而非有意识的权力策略或道德推脱。

5.3.1. “开玩笑”: 情境定义的话语重构

F-005 中, 工作人员制止 C-G 后, C-G 的回应过程如下。首先, C-G 在被制止后“仍不停息”, 继续说出攻击语言; 随后, 在工作人员追问“你为什么要对别的小朋友说这样的话”时, C-G“不回应”; 最后, C-G 主动补充一句“这是在开玩笑”, 之后未再说话。这一“主动补充”值得关注, 它发生在沉默之后, 似乎是 C-G 对工作人员追问的一种事后解释, 而非即时回应。

从发展心理学视角看, 4~7 岁儿童正处于“假装游戏”(pretend play)的高峰期, “开玩笑”可能是其将冲突性互动纳入游戏框架的习惯性方式, 而非有意识的道德推脱策略。T1 的观察提供了佐证, 儿童说出羞辱话语后, 常以“开玩笑、只是好玩”回应, 这种回应模式可能是从同伴互动或媒介内容中模仿习得的, 而非个体独创的策略。

5.3.2. “不回应”: 沟通中的回避模式

田野记录显示, C-D、C-F、C-G 面对成人追问时均选择沉默, 但沉默的具体表现存在差异, C-D“低头继续绘画或转向其他活动”(F-003), C-F“不回应”(F-004), C-G“不回应”且“眼神回避”(C-001 访谈记录)。这些非语言线索提示, 儿童的沉默可能伴随焦虑、困惑或防御等复杂情绪, 而非单一的“战术”选择。

从发展心理学视角看, 4~7 岁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均处于发展初期, 面对成人的严肃追问时, 沉默可能是其应对社交压力的本能反应, 而非有意识的抵抗策略。本研究不主张将儿童沉默政治化, 而是将其理解为发展中的沟通技能局限——儿童尚未习得如何在压力下进行有效的语言回应。

5.3.3. “你回去多上网”: 代际知识边界的浮现

F-002 中, 女孩 C-C 面对工作人员询问绘画内容时回应“你回去多上网, 多了解一些”。当母亲随后以同样方式询问时, C-C 使用了完全相同的句式。这一回应具有三个特征, 其一是重复性, C-C 对工作人员和母亲使用同一句话, 显示这是一种程式化的回应模式, 而非针对特定对象的即兴反应; 其二是终止性, 两次回应后对话均被终止, 工作人员“未再追问”, 母亲“笑了笑, 未追问”, 显示该话语的功能是结束对话; 其三是排他性, “多上网”将成人定义为“不懂的人”, 将儿童自身定位为“懂的人”。

T2 提供了类似的跨场域观察, 儿童以“你跟我们代沟”反驳教师教育。这些资料共同提示, “代沟”话语可能是儿童在媒介饱和和环境中自然形成的社交习惯, 而非有意识的资本积累策略。而 4~7 岁儿童正处于自我认同发展的初期, 通过强调“我懂”来确立自身位置, 这可能是其正常心理发展的表现。

5.3.4. “网络上学的”: 来源归因与责任认知

F-004 中, C-F 对“为什么要这样说”选择“不回应”, 但对“在哪里学到”回应“网络上”。这一选择性回应值得关注: C-F 区分了“动机”(为什么)和“来源”(哪里学), 对前者回避, 对后者回答。这可能反映了 4~7 岁儿童因果推理能力的发展特征即他们能够指认外部来源, 但难以反思内在动机。

将责任归于“网络”, 在相当程度上符合该年龄段儿童的外部归因倾向, 将行为原因归于外部环境而非自身。本研究不主张将其解读为“责任外部化”的道德推脱策略, 而是将其理解为发展中的因果认知局限。

6. 讨论

6.1. 理论补充: 从“语义空心”到发展不同步

现有儿童网络语言研究多以“语义空心”解释儿童的网络语言使用, 认为干预核心是帮助儿童理解

词义。本研究的探索性发现提示,在就医患儿这一特殊群体中,部分儿童可能呈现“知义不知害”的特征。这一现象需要置于 4~7 岁儿童正常道德发展框架中理解——该年龄段儿童本身处于共情能力和换位思考能力的发展初期,数字媒介环境可能放大了语义认知与伦理认知之间的发展落差。

本研究不主张“修正”或“颠覆”现有理论,而是认为“语义空心”与“知义不知害”可能代表了儿童网络语言使用的内部异质性。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两类儿童的比例如何?其发展轨迹是否存在差异?干预策略是否需要区分?本研究的价值在于提出了这些问题,而非提供确定答案。

6.2. 语义 - 伦理认知发展不同步的三重影响因素

6.2.1. 媒介环境：短视频的碎片化呈现

短视频内容高度碎片化,语言被剥离了完整的社交情境,仅保留娱乐化、刺激性片段,儿童刷视频时仅截取“好玩”的语言片段,完整的伤害场景、对方痛苦情绪被完全剥离,长期接收去伦理化的语言片段,难以建立话语与伤害的关联。T1、T2 均提及儿童过早接触手机短视频,媒介环境是认知发展不同步形成的底层诱因。

6.2.2. 同伴环境：群体互动中的笑声反馈

多名儿童访谈记录显示,同伴听到攻击性网络语言后第一反应是集体发笑,群体笑声形成隐性规则,将羞辱话语定义为有趣互动,个体产生的微弱尴尬、不适会被集体笑声覆盖,道德判断暂时悬置,长期在“笑”的同伴氛围中互动,儿童逐渐习惯忽视语言伤害,维持认知发展不同步的状态。

6.2.3. 成人环境：多方回应的协同不足

家长、教师、社工在应对儿童网络语言时,普遍存在回应方式不一致、缺乏协同的问题。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通过道德脱离、责任心等中介变量影响青少年的网络不道德行为(吴鹏等, 2013),提示家庭媒介教养方式对儿童伦理认知发展具有深层影响。F-002 中母亲“笑了笑、未追问”,T1“不知道怎么回应”,T2“没有办法”——这些观察显示,成人之间尚未形成一致的回应策略,儿童可能在混乱的反馈中难以建立稳定的伦理认知。这一现象更宜理解为多方干预的协同缺失,而非抽象的“结构性”问题。

6.3. 医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回应困境

作为微笑空间实习社工,笔者在现场制止 C-G 攻击性语言时,仅能采取“不许说”的行为制止方式,无法有效引导儿童感知伤害,这一困境与受访教师、学校社工高度一致。现有社会工作、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侧重行为管理、游戏治疗技巧,缺少儿童网络语言伦理对话专项训练,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长期偏重通用理论与方法(王思斌, 2011),对数字媒介环境下儿童语言伦理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面对低龄儿童攻击性网络话语时,一线社工普遍缺少专业介入工具。

单纯行为制止只能暂时压制语言表达,无法促进儿童伦理认知的正常发展,甚至会促使儿童转入私下、网络场景使用攻击性语言。由此凸显本研究探索“伦理对话”干预思路的实务价值。

6.4. 拓展讨论与研究展望

6.4.1. 性别维度拓展

样本中男性儿童主动创造、使用性别攻击性语言,将“女性化”作为攻击逻辑中的性别贬抑手段;女性儿童多为旁观跟随者,极少主动发起攻击。但仅 3 名儿童样本不足以支撑完整性别机制分析,仅作为补充讨论,不纳入核心结论。

6.4.2. 研究展望

第一, 进行量化研究, 编制儿童网络语言伦理认知量表, 大规模调研“语义超前、伦理滞后”型儿童的比例; 第二, 进行干预研究, 开发医务社工专属“伦理对话”游戏辅导方案, 开展前后测行动研究; 第三, 进行样本拓展, 纳入家长访谈、多医院/多学校场域对比, 尤其需在普通儿童群体中验证本研究发现的适用性; 第四, 精确年龄分层, 收集具体年龄数据, 追踪语义-伦理认知发展不同步随儿童年龄的变化趋势。

7. 结论与建议

7.1. 核心结论

第一, 在本研究场域的就医患儿群体中, 部分儿童呈现出“知义不知害”的认知特征, 即能够解释网络语言的语义内涵, 但对语言可能造成的伤害缺乏共情反应。这一现象需置于 4~7 岁儿童正常道德发展阶段中理解, 数字媒介环境可能放大了语义认知与伦理认知之间的发展不同步。

第二, 儿童通过“开玩笑”的话语重构、沉默回避、网络知识区隔、责任外部化等策略维持这一认知状态。这些策略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是发展中的社交习惯, 而非有意识的权力策略或道德推脱。

第三, 短视频碎片化媒介、同伴集体笑声机制、多方干预的协同缺失, 可能共同影响了就医患儿的语义-伦理认知发展。

7.2. 分层实务建议

7.2.1. 医务社工直接临床服务: 以伦理对话替代行为制止

摒弃简单“不许说”, 尝试共情提问: “你觉得小朋友听到这句话心里会难过吗?” “如果别人这样对你说, 你是什么感受?” 依托游戏、绘画疗愈场景开展常态化伦理对话, 促进儿童换位思考能力的发展。

7.2.2. 家长教育服务: 开展医务社工亲子小组

引导家长避免对儿童攻击性语言一笑而过, 及时开展情绪引导, 警惕家庭默许行为对儿童伦理认知发展的影响。

7.2.3. 高校专业人才培养

社会工作、学前教育专业增设儿童网络语言伦理实训模块, 训练社工、教师共情对话实操技巧, 弥补现有专业教育盲区。

7.2.4. 医院疗愈机构政策

微笑空间等儿童疗愈场域可探索制定适合医疗情境的语言规范, 明确区分线上网络话语与线下疗愈空间表达规则, 构建安全、尊重的互动环境。

7.3. 研究局限与反思

本研究作为探索性案例研究, 存在多方面局限, 需在解读研究发现时予以充分考虑:

样本特殊性。本研究样本为北京某三甲医院就医患儿, 其疾病状态、诊疗程序带来的焦虑及医疗环境的陌生感等因素可能系统性地影响其情绪状态与社会交往模式。例如, 医疗环境中的权力依赖关系, 如患儿对医护人员、家长的依赖, 可能强化回避型应对策略; 疾病带来的情绪压力可能降低儿童对社交规范的敏感度。因此, 本研究发现更适用于理解医疗情境中的儿童网络语言使用, 而非普通儿童群体。未来研究需在普通儿童群体中验证这些发现的适用性。

研究者身份的双重性。笔者兼具社工实习生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这一身份虽提供了独特的内部视角,但也可能带来系统性偏误。作为实习生,笔者对“有效干预”的渴望可能使数据解读偏向“需要干预的问题”;作为研究者,笔者对理论创新的追求可能放大“知义不知害”现象的普遍性。为降低这些偏误,笔者在编码过程中采用“编码-间隔-再编码”策略,并将反身性记录纳入分析过程,但完全消除身份带来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权力关系对数据的影响。儿童访谈在工作人员(即研究者)与儿童之间进行,这一权力不对等可能影响儿童的真实表达。C-G在访谈中的“眼神回避”可能反映对权威的畏惧而非认知发展不同步;“不回应”策略可能是面对所有成人的习惯性反应,而非特定于网络语言话题。未来研究应考虑由非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以降低权力效应。

理论解读的审慎性。本研究在分析中借鉴了多种理论视角(框架分析、语言与社会边界、沟通回避等),但这些理论多源于成人社会研究,将其应用于4~7岁儿童时存在过度解读的风险。本研究已尽力在发展心理学框架中定位这些现象,但理论应用的适切性仍需进一步检验。

数据完整性。5次观察均发生在绘画/折纸环节,未能覆盖音乐疗愈等核心环节;儿童年龄仅知4~7岁区间,未确认具体年龄,影响与皮亚杰、科尔伯格阶段理论的精确对照;缺乏家长访谈,无法充分讨论家庭媒介环境的影响。

参考文献

- 安·玛丽·哈尔佩妮, 简·皮特森(2020). *皮亚杰导论*(钱雨, 等译).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陈会昌(2004). *道德发展心理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
- 陈向明(2000).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
- 范翠英, 潘清泉, 游志麒, 等(2012). 儿童道德脱离的影响因素及其与社会行为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10(3), 167-171.
- 顾东辉(2019). *社会工作概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 黄勛喆, 褚晓伟, 刘庆奇, 等(2019). 网络欺负中的旁观者行为. *心理科学进展*, 27(7), 1248-1257.
- 李欣, 刘爱书, 韩毅初(2023). 缘何内省不疚? 儿童青少年道德推脱与欺凌行为关系的元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1(3), 723-728.
- 刘金花(2013). *儿童发展心理学*(第3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牛煜辉(2025-12-10). “网络烂梗”背后, 是孩子的心理需求. *中国人口报*, p. 7.
- 王思斌(2011). *社会工作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兴超, 杨继平, 杨力(2014). 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关系的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7), 1092-1102.
- 吴飞(2009). “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 *社会学研究*, (2), 177-199.
- 吴鹏, 刘华山, 鲁路捷, 田梦潇. 青少年网络不道德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道德脱离、责任心、道德同一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2013, 36(2), 372-377.
- 杨继平, 王兴超(2012). 道德推脱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心理学报*, 2012, 44(8), 1075-1085.
- 杨继平, 王兴超, 高玲(2015). 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 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5, 31(3), 311-318.
- 杨继平, 王兴超, 高玲(2010). 道德推脱的概念、测量及相关变量. *心理科学进展*, 18(4), 671-678.
- 赵雪凝(2023). 网络用语对语文教学的影响及对策. *汉字文化*, (14), 135-137.
- Bandura, A. (2016). *Moral Disengagement: How People Do Harm and Live with Themselves*. Worth Publishers.
- Bandura, A., Barbaranelli, C., Caprara, G. V., & Pastorelli, C. (1996).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364-37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1.2.364>
- Bourdieu, P. (1992).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Polity Press.

- Braun, V., & Clarke, V. (2006).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in Psycholog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3, 77-101. <https://doi.org/10.1191/1478088706qp063oa>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Harper & Row.
- Thornberg, R., Daremark, E., Gottfridsson, J., & Gini, G. (2020). Situationally Selective Activation of Moral Disengagement Mechanisms in School Bullying: A Repeated Within-Subjects Experimental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Article 1101.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01101>
- Thornberg, R., Pozzoli, T., Gini, G., & Jungert, T. (2015). Unique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Moral Emotion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on Bullying and Defending among School Children.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116, 322-337. <https://doi.org/10.1086/683985>